

學術交流與知識生產論壇會議記錄

時間：2009年1月6日（星期二）下午兩點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 A304

14：00 – 16：00 學術交流經驗下的知識變化

論壇參與人：

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

柯思仁（新加坡南洋大學）

何春蕤（中央大學英美系）

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6：15 – 18：15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學術機構交流的問題意識

論壇參與人：

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

主辦單位：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室、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交通大學新興文化研究中心、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文化研究學會

陳光興：來的不管是老師或同學們，不是陌生人，大部分都認識不過，還是說明一下今天脈絡是什麼？因為學會最後一場，講了一點脈絡，我稍微說一下，其他假如必要的話，其他小何、人鵬、Joyce 可以指出些其他的。我也許可講細一點，因為很多同學也搞不清楚狀況，反而，外面的朋友們還相對比較清楚是怎麼回事。

我們大概從二〇〇三年，開始所謂台聯大（台灣聯合系統大學）合作，主要是中央、交大、清華加上陽明，可是在人文社會這塊，陽明沒有合作對象，從開始成立跨校學程，就放在研究所層次的文化研究，可是不發學位。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除了促進各校合作，在人文社會後來也只剩下文化研究的提案，合作到現在促進了實質互動跟合作。因為沒有學位授予，也沒有那麼多壓力。過程中提了很多其他計畫，結果包括研究中的心的設立等等，也沒完全落實。前年開始台聯大在教育部正式立案，所以，重起爐灶推這件事。可是，學程從二〇〇三年到現在一直都還掛著，很多活動都是學程在做，是在這環節裡檢討要重新推人文社會的合作。劉紀蕙老師代表去參加這個會議，要繼續提文化研究的下一階段，所以，我們自己也在重新談這件事。

有一種提法是，把它變成學會學程，也許可在系統裡，在碩、博士班設立，我們的主觀期待是，可給學校一、兩個正式員額，那就可在系統裡推動。另一層次是要用什麼形式？原來是想用跨校研究中心整合起來，但還在想像提案階段。現在碰到台灣大環境的改變，經濟情勢不是很好，所以，到底可以轉化成什麼樣

子？我們是在這樣的環節下，開始重新談國際學位學程（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目前是在準備想像構思期間。而台聯大已經被提案，又剛好學會的年會在開，外面有這些朋友來了。我的提案，所以，我負責任，趁他們來的時候，大家繼續談的這個事情，不管怎樣，聽聽外面（的聲音），台灣以外的地方，未來不管是新加坡、大陸香港的合作，還是要持續進行的，也期待外面來的這些朋友可以給我們些有關推動的意見。

我自己的想法是，在過程裡跟嶺南做些在體制層次的設計，包括我們在中央大學在二〇〇六年簽了一些合約，希望推動學生、課程互換等。當然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是在這些基礎底下我們繼續往前走，可是，光在我稱之為行政層次上討論問題，似乎是不夠的，要落實這些問題，在知識的層次上，到底要怎麼去構築呢？今天的動力大概是在這裡。學術交流和知識生產這個題目，很少人在知識上談這個問題，也不知道怎麼談，所以，我拋出來這個問題，也把其他人像小何搞得很焦慮，我很抱歉。我認為，因為大家是熟的朋友，比較可以試驗能不能迸出些可能性。什麼是在知識層次上討論問題？大概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把這些朋友們拖下海，我自己先試著談談看。

有幾個層次：一個是個人作為所謂的學者，在別的地方跑、在別的地方待，累積了一些經驗，這些經驗沒被討論過。就我個人來講，這些經驗到最後會影響到自己的知識，但這些經驗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初步地整理出來？也許，轉交給年輕學者或博士生、碩士生這樣的經驗。可是每個人的經驗是不一樣的，也許其他老師可談出一些不一樣的問題。我們的形式可換成更好的方式，（目前）形式上切成兩塊，一個比較在談交流，包括戴老師、思仁；思仁是台大畢業的，戴老師比我跑的地方還多，在台灣也待過，第一次來大概是劉老師在比較文學所時待過，後來在世新也待過。這些東西到底表面上對個人到底產生了什麼作用？這是第一場可以這樣來理解的。

第二場的想法，羅崗後來沒來，這牽扯到大陸簽證到現在還沒下來，爾後也沒有答案。我們原來的想法，但也可以更動，是包括嶺南、交大社文所、劉人鵬等，不同機構一直不斷進行國際交流研究，即大學生、本科生、研究生會跑到這個地方來，或者，學生到外面去。近來也有很多的經驗、問題，甚至對上課的形式產生一些改變；這部分我們的經驗不是很多，所以，也許其他朋友可提供一些意見。我認為做這件事，是為了可以更具體地去設想兩件事，如我們可以怎樣去設想、設計跨校的學位學程（degree program），而不是反正就是個學程（program），大家想來就來，不來就不來。這是第一個層次，怎麼能比較有生產性地設想？

第二個層次，是繼續做交流，在台灣很清楚有一個介面是重要的，就是前兩天也提到的，是把華文世界當成一個國際空間來操作。這樣的東西在設想、設計上，在不同的機構間可以怎樣進行合作。累積過去的經驗，這牽扯到好多層次，一個是學生層次，碩博士生這個層次，還有一個層次我看到的是年輕的老師，或是，剛畢業的新加坡英文叫 PDA 就是博士後的層次，還有，不同層次在這個流動

都會發生，還有教師互換。可是這都是表面的東西，形式上是這樣，實質上在動的時候還要再想。所有我設定的這些問題都不清楚、也很模糊，只是企圖碰撞看看，能不能在討論裡跑出來一些東西。這樣可以嗎？

我先講自己這一塊，較具體的經驗，大概，所謂實質學術交流，是指離開台灣，不是指開會，而是跑去不同地方長期待在那裡。大概有幾次遺留比較大影響的，除了留學期間。這（次講的）是另外一次，是二〇〇一年後半，動力是執行一個研究計畫，那時提的研究計畫「東北亞首都城市裡消費社會的形成」，不只台北包括北京、東京、還有現在的首爾，那時的漢城。在這些條件下，想要瞭解一些狀況。我先講這個研究計畫是失敗的、沒做出來，但從另一個層次上是成功的。當初的設想是假如這個計畫作不出來，可是，（要把）事情做到。這是什麼意思？後來的失敗牽扯到很多原因，舉例來說，語言問題。因為我不懂日文、韓文，很多資料靠朋友，包括同學也做不到；可是，反而透過這個東西形成了另些可能性。

在這個條件下，我跟韓國朋友聯繫，他們說你要來，你乾脆就來教書好了，我正好那段時間可以休假。便去韓國延世大學待了一個學期，那個學期運氣比較好是，到了延世大學的社會系，一些女性主義的朋友幫忙，趙惠淨把我拉去。透過這些方式對我幫助很大：一是在大學部開課，帶大學生念既有的消費理論、研究，透過這個反而跟同學互動，他們開始做這些研究、調查，讓我理解一些狀況，而且，透過這種課做為媒介，他們把我帶到韓國社會內部。到現在我還記得，有一個小組的期末研究報告，是做延世大學附近的愛情賓館（Love Hotel），在那附近他們調查出來有七十幾家；還有一個是間接參照點，在漢城大學附近有一百多家。我後來發現這個題目其實很震撼，但在韓國內部也不做，一些狀況跟現在台灣社會很像，是慢慢在一九八〇年代形成的。我記得他們做了這樣的研究報告，對我自己幫助很大。

另一個層次，是我在研究所開了一門課，有點自私的，他們要我把我自己累積的一些英文研究讓研究生讀，然後討論、回應。而其實我是在準備我自己的初稿，這初稿從二〇〇一年到現在還在出版中，已經在最後編輯階段。弄到最後發現（影響）是很漫長的，可是，那就是第一階段形成初稿本身。在互動過程中，也修改了很多不同的想法。這意味著什麼？我到後來才開始明白，也比較可以講清楚，即那半年的經驗，造成知識上很大的轉變。我暫時這樣說，一個重要的東西，也許是一種方法可以推進，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生存地區以外，建立其他參照點。後來的首爾，當時的漢城，後來也慢慢變成我寫作上，一個重要的參照點。最後，我會回過頭來集中在這點上講。

漢城之後，我幾乎就直接去了北京，在北京的清華大學，那時剛建立了兩校間的互動與交流，因為社會系有些朋友所以他們收留了我，有些很重要的、之前未有的經驗在那裡發生。我舉最簡單的，那次交流有一部份不是寫作層次或閱讀層次學術，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帶入當地生活經驗的系統裡。外面的人大概不太清楚，但戴老師大概知道，我住在清華他們叫做「桶子樓」（的地方）。台灣學生

一定聽不懂，「桶子樓」牽扯到社會主義經驗、遺產。你假如住在桶子樓裡面，你大概不需要抽象理解，桶子樓是社會主義過程留下來的東西；它原來裡面是沒有廁所沒有洗澡間，洗澡間是在樓下一個共同澡堂，是共同生活的地方，包括餐廳這些（空間）。「桶子樓」後來裡面加了可以做飯的小爐子和廁所，這個大概都是你不住在那個地方、深入生活裡面，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我多講一點。就是因為這些經驗累積，你慢慢發現，其實我們在談很多東西的時候，都是很抽象的。我講最簡單的，已經不太抽象的——「城市」。你後來會發現，每一個地方的城市經驗其實是高度不同，（尤其）一旦你進入生活的層次。什麼叫做進入生活的層次呢？這包括很簡單的銀行存款怎麼存？都是個複雜的問題。在台灣有高度的管制，後來發現是很奇怪的。舉例來講，北京有一個很奇怪的，它是一本存摺上面什麼貨幣都可以存，這在台灣是無法想像的（戴錦華：那叫一本通）這只是舉一個很小的例子。事實上，這是我們真實生活物質條件的關係網絡，鋪天蓋地地，有自己的在地體系，可是這個東西沒有辦法仔細談。那天晚上吃飯的時候談過，每一個學術體制都有他的在地性、（有自己的）歷史性形成，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們一聽我們台灣學校預算體系是這樣，他們都嚇壞了。因為香港跟新加坡是不容許我們所有的作帳，他們是不可能的；我們要預墊經費，他們也覺得奇怪的，因為（他們是）學校要把錢先撥下來預支，我們整個系統是另外一套。

所以，這些經驗累積你看了很多後你會發現你很難這麼抽象地在談很多事情，或是，你要理解很多東西時，不是你只看文字、書寫本身，你就能理解。也是在這些條件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對我來說便抽象又不抽象了起來。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但是，社會主義的遺產（還在）；所謂的遺產是他還活著，這對我來講是一個滿大的發現與震撼。舉例來說，外面常有些講法，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開始走資等等、等等，可是你一放到生活體系底下，就不是這麼簡單可以理解的。清華大學的校園裡面很多老師的小孩去跨國公司上班，但是住單位的房子，而單位到現在是什麼意思？大概也沒太多的房租也就是說他的居住是社會主義體制，遺留下來就是這樣的單位，反而已經沒有了，但是，他還是住在裡面，他在這個條件底下去跨國公司做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然後，你又發現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他們所謂走資，北京大學老師或教員出版社的人去買房子，貸款方式跟我們理解完全不一樣，學校裡面好像要撥什麼錢來作這些事，我聽你（戴）那個學生日文系賀雷，他在那個出版社本身，他的貸款方式到現在我還講不清楚。跟我們想像不一樣，好像資本主義就資本主義不是這麼簡單的，那些經驗還不要講說你慢慢開始累積知識層次上的問題。

我有些重要的經驗，是戴老師給我機會，我中文書稿有一稿是跟他的學生們一起讀，過程中他們給了我很多意見。我舉一個最簡單的，我有提過這個我認為台灣有個重要構成，一個意識型態跟精神型態的構成，我稱之為「親美反共」。這個東西在台灣的語境裡你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在抽象的層次上，你可以想像這個話，你拿到北京去那個對口「親美反共」的語言，描繪到底是什麼？

我有講清楚嗎？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的「親美反共」，他那個地方叫做什麼？這個我們完全不理解，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知識生產的過程時，很多原來不具有問題的，跑到那個環境去閱讀、討論時問題會出來，造成的效果是會把原來自己在做的知識相對化；也就是說，這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所以，碰到那個問題後，再改初稿就會進不去。那麼，到底要怎麼去理解一個對應的關係？

講白一點，在東北亞，從南韓、日本到香港、台灣，是在所謂資本主義陣營裡面的生活圈，我暫時用這個語彙，是大概可以用這種語彙來理解，但也都不精準。可是，另外半個世界是怎樣，其實我們不太清楚，也不知道怎樣進行分析，有這樣的困境，是在這些互動關係裡面慢慢出現，到現在也沒解決，企圖想要理解，也都有一定的困難度。我覺得北京這半年生活經驗，造成我後來看事情的轉換，就是你以為世界上是這樣，其實不是。還有我那時最大的經驗，舉例來說，我認為台北跟漢城的貼近性、類似性高於台北跟北京，意思是幾十年社會主義的經驗，是重要的東西，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分析，或是，我們認為所有社會應該有某些機制，可是事實上真實狀況不是那樣，所以也就會慢慢對自己原來的知識體系，產生至少是相對化也（可以）是懷疑。

還有一個動力，後來我在二〇〇四年、二〇〇六年去了新加坡，中間有段時間是在印度，那完全牽扯到知識的問題，我去的時候他們在讀我的英文稿，後來他們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直接影響到我書寫的轉化。舉例來講，我的初稿有個重要的字眼是去殖民（de-colonization），到那個語境裡，你發現這個東西有問題，為什麼呢？他們說：你跟我講的這個東西不能這樣講。因為這個語彙，在他的語境裡意味著一件事情，就是脫殖民地的建國，也就在那個歷史環境裡具有特別意義。現在跟我們講這個事情，沒辦法這樣去理解，這是他們的理解。所以我後來中文書改成「去帝國」，有部分原因關連著那些經驗碰撞與理解。我的意思是，你必須把這些經驗擺放進不同的環境裡，原來不是問題的東西，會跑出問題，在這個層次的交流是關鍵的，可是短期的這些交流很難產生這樣的作用，因為很多會議、很多東西都是很快速的。

我發給大家有一篇東西，是後來寫的；或許已經回來了，二〇〇六年寫的一篇小文章，這篇是後來思仁把我拿去早報刊登的。這樣講好了，這篇文章是我一輩子寫文章，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怎麼說呢？這篇文章，當初大概是十月鍾喬的劇團要我幫他們寫個東西，我說，我實在沒東西可寫，但鍾喬他們也一直往亞洲移動，那我就來試試看寫這篇文章好了。這篇文章牽扯到我在新加坡時間較多，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在講一些食物；其實，是因為在新加坡有時間跟這些小攤販、賣雞蛋、賣什麼的人產生了些關係，我有時間寫一些留下來的的心得。新加坡給我滿重要的契機去理解它，跟外面的人理解的新加坡是不一樣的；外面很多人，我認為其實不理解新加坡這個層次，我覺得其實是非常豐富的，雖然有些東西是被國家規約出來的，舉例來講他們叫做 hawker centre 我們叫做大排檔或什麼？形成一個重要的社區公共空間，也就是公屋大部分都有飲食空間，到了晚上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群中老年老頭坐在那裡喝啤酒，啤酒最容易取得，因新加坡

酒很貴。我也是在新加坡待著喝了太多啤酒，所以得了痛風。而這些一定會擺著一大堆在桌上，有部分是在展示男性氣質，起碼提供了社區空間讓大家看電視。這是國家規劃可是他沒有 intended consequence 亞洲地區很多國家反而沒有社區共同空間來生活，香港有一點，我舉這樣的例子，透過這些經驗，會回來看到自己社會的差異。

這樣說好了，透過這些文章我企圖做件事，是給自己一個想法：越界是為了要看清楚自己的處境；這是我所認知的所謂的文化研究，是怎樣去解釋自己的生存環境。可是，到底要怎麼做到？我認為參照點的建立是很關鍵的，你越能夠深入地方的生活狀態跟歷史環境，而且，有些具體的感覺時，會幫助你理解自身的環境是怎麼回事。越界的人大概都有這樣的經驗，包括永生講的一些東西，我都不確定他在香港會不會這麼說？可以這麼直接了當？也就是我們在自己的環境裡，很多內在邏輯是不需要講、也不能講的，反而越界的時候，要跟朋友說台北紅衫軍是怎麼回事？你要把事情講明白的。所以越界有一個重要的契機是透過越界來解釋自己存在的條件和差異，特別是透過差異去解釋差異的存在。

我最後講一點，那個研究計畫後來是失敗，但對我來講，建立了一些參照點，東京我去住了三個月，東京比較困難，牽扯到語言很大的差異，跟社會生存環境很不一樣的，這些點對我後來整個思考問題的方向有很大影響。可是這些東西直接影響到講不清楚說明明白的書寫，可是，慢慢有意識往這些方向去推。我還有一篇文章是最近發表，但還沒正式發表，就是在台社二十週年寫的這篇文章，透過白樂晴談南北韓分斷體制，用這點來參照台海兩岸關係的情況，那是一個思想的文章。假如大家有時間閱讀，那篇文章在最後的部分，我覺得我已經準備了很久，因為你瞭解了白樂晴的思想後，是要把他落地的，就是要把他放進生存環境去的，沒有落地的話，很難對照台灣的狀況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認為，我大概已經準備了十年，才能夠寫一點點在思想層次的文章，所以，我大概是在講這個意思。

最後，思仁在早報幫我發的這篇文章，我說它是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因為後來我發現我回到新加坡時，這些小攤販朋友們，都是有反應的，他們的朋友們讀了這篇文章，當然也替他們招攬來不少小生意，重要的是在他的社區裡面，他們變成故事的主體。所以，他們對我有種非常奇怪的，他們說以後吃東西不要錢，我說不要錢的話，以後我不敢來了。我講說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是說，這樣的書寫直接反饋到身上，還不是因為你替他帶來生意，而是經過書寫過程，在他們最大的早報上面，他們的生命產生了不同的意義。我覺得這對我自己的感覺是很直接的，我覺得以後這些文章可以多寫可以提供更多，這叫培力（empower）也不太對，應該說，讓大家開心點，好像生活是很苦似的。我先講到這邊。

柯思仁：謝謝光興。本來想好了些東西，不過剛才在計程車上，嚇了一下，有些東西已經忘記了。我在幾位老師面前明顯是很資淺的，我開始在大學裡教書到現在才進入第十年，研究中間有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到一半時被捲入了行政工作

裡，設立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幫忙設計本科生課程種種問題，到現在已經五六年。結果，不管在研究上思想上都受到滿多的影響。這學校不叫南洋大學叫做南洋理工大學，參加光興的會每一次把他叫做南洋大學，雖然我很想把它從南洋理工大學，改成南洋大學已經有一陣子，但是一直都沒有成功。我在思想跟研究上，能夠分享的並不多，可能就是剛剛光興不講的東西，我得要去講一講，包括我讀書留學的經驗，以及在新加坡的圈子裡運作的情況。

稍微講我的讀書經驗，我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台大中文系在一九八零年代前，解嚴前我就畢業回新加坡；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的動力是滿大的，還沒完全爆發出來就可以感覺到滿強烈的。從學術訓練的角度來講，台大中文系，劉老師很清楚，是比北大還要傳統的、非常傳統的中文系，經史子集、聲韻訓詁的訓練。一方面，是以中國或中文為中心出發去看整個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等等，另一方面，對我來講是相當重要的訓練，是細讀文本的訓練。傳統中文系的訓練，文字讀得很細，而且是從一個字，或一個篇章裡去引伸的方法。就像我上一位老師的論孟導讀，讀論語，「學而時習之一」句話，一個「學」字就講了半個學期，非常佩服他。但也學到很多東西，怎樣從文本中單獨小點、很小的一個部分去引伸，那像老師在教我們現代小說，教王文興的一篇短篇小說，也是一篇小說講了大半學期，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這是西方的 close reading 的系統。有意思的是，讓我感覺到讀中國傳統經典的方法跟西方的 close reading 的方法，居然有很多能夠互相對照的地方，所以，從對文本注重的角度，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了碩士，在楊松年老師的指導下，做新加坡戰前就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戲劇研究，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訓練，是歷史文本考掘的一種訓練。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去看微縮膠捲 (micro-film)，在圖書館昏天暗日地看微縮膠捲，在很封閉的空間裡，一天看十個小時的舊報紙排成的微縮膠捲。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訓練，怎樣從歷史材料中，去尋找可以作研究的對象。後來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我的老師是芝加哥的博士訓練，從他的上課跟指導的過程當中，很重要的收穫是在現代文學文化理論方面吸收，以及怎樣把研究對象歷史化，注重它的歷史脈絡是史學過程，後來這個方法、視角，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即怎麼把文本放入歷史脈絡裡看待，這可說是我的訓練背景

我的研究對象跟一般傳統中文系或者漢學不太一樣，從早期碩士班在新加坡報紙看戲劇研究，後來博士時，我做高行健的戲劇，這是九〇年代末期，我從九六到九九年是作博士，那時候高行健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所以，幾乎沒什麼人知道高行健這個人，當時對高行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他早期在中國的時期，即八〇年代那幾個劇本。我當時想做的，除了八〇年代他在中國所寫的劇本外，還有，像現在我們比較熟悉的《生死戒》、《對話與反詰》、《夜遊人》這些後期作品。早期的作品容易作，一般人的作法也是比較把他放在中國的先鋒戲劇運動及整個中國思想脈絡裡看待，跟整個中國的歷史語境緊密結合來研究；但後期作品要怎樣做研究呢？有些人會說是有普世性 (universal)，像似西方的存在主義、荒謬劇場脈絡滿接近的，怎麼去對應在中國或中文作家去處理這些作品？

我的方法跟向來興趣有關，就是放在一個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而作為一個表演，我沒辦法看到很多高行健先生戲劇的演出，但是，可從他文本的敘述設法想像建構表演的情況。於是，把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又拉開，加入了不一樣的層面，就是作為劇場表演（performance）的角度，劇場表演跟表演所要傳達的意義，以及，意義的相關政治有密切關係。所以，我從一開始非常傳統的台大中文系，慢慢加入了很多不同角度、層面，這是從訓練的角度來說。

回到新加坡之後，只把高行健研究轉換成可出版的書以外，我幾乎就不再做這個東西了，比較關注新加坡本土環境裡面的科技。這牽涉到我在兩千年以後的研究重點變成在地研究。等下我會講，在地研究與國際連接的關係與問題。我這幾年所做的重點是新加坡郭寶坤，新加坡的一個戲劇家、知識份子、文化人，從郭寶坤的研究做起擴大到新加坡五〇、六〇、七〇年代，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開始進入新加坡的歷史，從文化到新加坡整個政治、社會、歷史的範疇裡，這些年來我的重點一直放在這部分。這個部分的問題在哪裡呢？下面我會提到，第一、以新加坡的環境裡，在地研究作得非常少，所以，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比較多是從一個歷史建構、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做。也就是要去挖掘一些現在大家不知道、新加坡人也還不知道的東西。這又回到我十幾、二十歲時受到的訓練所看到的東西，那些微縮膠捲所收集的一些材料，把這些材料全都收集起來，希望能夠敘述出一個樣貌。還沒有辦法進入批判研究的層面來做，還是個歷史敘述，當中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而另一個問題是，華文在新加坡的情況，我那天在台北時有提到，現在，在大學裡，用華文進行研究的人，只有在中文系裡。中文系授課媒介是中文，老師也可用中文發表文章；但除了中文以外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或是其他科技，都只用英文、只承認英文發表文章，中文發表文章都不算的，平常教學也是完全用英文教學。可想像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相形之下顯的更少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我們的系裡現在有二十幾個人，但是加起來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人，可能不多過一個手掌、五隻手指那麼多，所以，怎麼形成一個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個很大的困境。這是第一個在新加坡用中文做在地研究所形成的一種特徵，它在新加坡整個大的知識環境中，是屬於非常邊緣少數的社群。

既然在新加坡裡是一個這麼邊緣少數的社群，那應該要怎麼辦呢？有沒有辦法走出新加坡？就是光興所說的這個華文國際的概念。因為光興的關係，我在文化研究學會稍微有些參與，這幾年來參加三次了。但是，我的感受是很明顯的，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如果文化研究年會，可以算是一個社群的話，新加坡在地研究在這個社群裡，顯然也在非常邊緣的位置。我常常來這裡討論問題時，每次都要從頭說起，是沒有像今天從台大中文系說起。但不管怎樣都要從頭說起，因為大家不瞭解，所以，這幾年來都要聽我說個十幾、二十分鐘，沒辦法深入進入可以交流的層面。我可感覺到華文社群裡是非常邊緣，是雙重邊緣。

如果可以借用華文國際的概念來說，我參與的華文社群裡，另外有一個華文

戲劇節，從九三年香港開始，後來在香港、中國、台灣、澳門都舉辦過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二月在台北舉行。華文戲劇節，當時除了兩岸四地以外，新加坡因為郭寶坤的參與所以在新加坡裡面也說話也滿大聲的，但新加坡幾次要爭取主辦都沒成功，為什麼呢？北京那邊的反對聲音很大，因為他不要脫離兩岸四地的框架，加進新加坡就變成國際華文戲劇節，他不能這樣做。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參與，在學術領域來說感覺到邊緣，在華文戲劇節的架構來說，架構本身就沒辦法包含新加坡華文相關研究，是框架本身的限制，是被排除在外。郭寶坤過世後，我參加了幾次都感覺格格不入，以北京作為中心的力量非常強大，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邊緣的特徵是更明顯了。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在新加坡用英語討論的社群相當活躍，雖然新加坡人口並不是很多一千四百多萬，但現在有三間主要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五六年前才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他們也有一個社會科學經濟學院。英語的圈子有一個群體，從公民社會跟學術的關連來說，他們也有些參與雖然說，人數不是太多。從九〇年代開始到現在，近二十年來，公民社會有一定的聲勢，尤其是在創造一個空間進行交流這方面。所以，我需要參與這個社群，否則從在地研究的角度來講，就完全被排除在外了，我得用英文來參與這個社群。當我參與這樣的社群時，我的思考與關注點也會受到影響。

比如說，今年九月在新加坡參加的亞洲研究所，也就是光興在新加坡的時候待的機構。他們主辦一個研討會叫做 Chineseness abound 這要怎麼翻譯？幾乎不可譯呀！Chineseness、中國性、華人性或中華性，只有用英文才能談，在新加坡中國性幾乎不能談也不需要談，只有在邊緣時，界線以外時，才能談你到底有沒有 chineseness。用英文來談 chineseness 才有辦法進行討論。前陣子在美國參加會議，談華語語系的文學與文化這個東西也是不用中文能談的。不管是參與新加坡在地研究的角度來講，或是，從新加坡以外的國際範疇來講，英文可以提供的切入點與視角，是對我的新加坡研究或中文研究，有一定的啟發。

拉拉雜雜談了這些，最後我要回應陳光興講的，這篇文章是他寫過的文章影響最大的，我也深深體會，怎麼說呢？我在新加坡這幾年，其實還算滿常發表文章的，有個文化時事評論的專欄，寫了好幾年，在新加坡讀的人滿多，在報紙上發表，看的人多回應也很多，有時想想我不如專寫這些文章就好，別寫學術文章，寫學術文章去到哪裡都沒有人看，不管在那個社群裡，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沒有人看。像這類直接批評社會現象，或是，討論文化課題，可有交流互動情況出現。

所以，現在我作的，其實我也不太管，我的研究重點以新加坡來說，比較放在郭寶坤跟新加坡本土原始材料的收集。幾年前開始郭寶坤過世後，他的圈子中推選我出來當總編輯，編一本郭寶坤全集，我們計畫編十卷，雖然過程較慢，現在第三本已出來，第四本也快出來了。這個滿足感不管是作為研究者、資料收集者或是社會參與的角度來說，個人收穫是滿大的，所以，就會繼續做。最近朋友在提要寫郭寶坤傳，到現在還沒找到適合的人寫。我想我要不要毛遂自薦一下，

不過這東西做起來可能要五年、十年的，可能要把很多學術的東西放在裡面。要從訪談、原始文獻、材料中挖掘，可能就要投入個五年、十年，就差不多不用寫別的東西了，我在思考到底值不值得、該不該去做，做出來顯然在學術方面是不受承認的。而我的生命就是剩下這二、三十年在學院裡，這樣就要佔掉一半的時間，也許各位可以給我寶貴的意見。謝謝！

陳光興：在台灣知道郭寶坤的人大概不太多，可是他在東南亞是很重要的作家。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寶坤過世以前我好像是跟思仁還是一起去看他，他頭髮都掉光了。他在中國大陸出生，後來就一直待在（新加坡）他的劇作是多語言的，融合馬來文的。他對地方有很強的使命感，臨死以前都還很清楚，他說：「你們這些人要多來研究新加坡」，我們哪裡有研究新加坡啊？可是他很溫文儒雅，後來在整個新馬地區變成重要的思想資源，在台灣戲劇，尤其是演出的圈子裡，大概還知道他的重要性，這也是個很大的困境，如何讓像郭保坤的東西有中文出版。這都是些看起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是，其實也沒有，也就是東西流通的問題，新加坡的出版品如何進到（台灣），這是我們討論很久的問題。碰到這些人，你都會知道該要繼續推動，讓他的東西可以讓更多人分享。下面請戴老師。

戴錦華：本來準備就不太好，連著兩個出租車司機給我的震驚和憤怒，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剝奪了我吸煙的時間。所以，剛剛跑去吸煙，可是尼古丁不夠，所以，狀況不好。

這個題目我也還沒把握到光興到底要我說什麼？所以，說個人經驗比較容易；跟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們可能還是比較特別吧？就是我們在中國長大、中國出生，整個成長年代是文革的，從七歲到十七歲經歷文革。我們在冷戰分界線的那邊，造成的結果是，一是對在座的朋友們來說，到海外求學或到國外旅行是很自然的經驗，對我來說，大概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才開始成為可能，而這個可能是如此微小、如此特權。到今天為止，在中國有機會去做國際交流，還是一種特權。儘管現在，種種原因使得流入大學的錢開始多起來，會有學者可以自己出錢做國際學術旅行，同時，全球化的旅遊和觀光，也為中產階級以上的中國人所分享。但總的來說，絕大多數中國人或者中國知識界、思想圈，國際經驗，相對來說是相當少的。

到現在為止，中國留學生回國潮還沒發生，本來八十年代末回國潮啟動，但是六四，我有太多朋友家具都賣了行李都打（包），因為六四發生，他們就留在美國歐洲了。因此她們的學術生涯、思想展開都受到很大阻礙，我非常能理解他們這樣的選擇；所以到現在歸國潮也沒發生，所以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是相對封閉的中國大陸，這個封閉是指精神上封閉，不是指外在環境封閉，用封閉可能有太大貶意，其實不是封閉，而是自我關注——沒意識到自己是自我關注的。他所思考的問題、問題的提出、學術規範、學術傳承，是在這塊超大型大陸國家內部發生的東西，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因為是這種超大型大陸國家加上四九年共產黨政權建立，在二十世紀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經濟主權國家確立，為了保證國家能成為政治、經濟主權國家，美國陣營的決裂，繼而與蘇聯陣營的決裂，處在政治上被封鎖的環境中，作為政治經濟主權國家，試圖建立一種中國內部的現代文化，結果造成中國再如此幅員大，是個漢語中心，或說以普通話為中心、以北京話主的，其實是在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時候就發生的龐大漢字工作委員會，現代漢語標準化作為一種制度，然後有施行了簡體字。據我所知，本來是國民政府要推動的，在台灣本來也要推動但是大陸搶先一步所以為了隔絕這邊就停止了簡化漢字的方案，所有原因，造成漢語在大陸的強勢位置這種強勢位置強化了隔絕，國際交流的困難，形成自己的一套體系。

比如說，在當代中國研究當中我發現其實共產黨政權確立後，他內在建立一個以共產思想為目的的龐大翻譯的出版系統，這樣龐大翻譯出版的系統當然不可能僅僅翻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就變成系統地對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西方文化的介紹。在這樣的意義上，實踐在中國文化內部，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內部把西方現代文化或叫人道主義或者資本主義文化，非常內在地引入中國現代文化當中，但是，始終由漢語系統來表達，是個非常奇特的東西，現代中國的這種經驗造成很多歐洲國家我對他們文化歷史的瞭解比他們人文學者還多，這是個真實經驗，對他們文學著作的閱讀很多是他們不知道的，不知道這個人？難道這個人有這本書嗎？這種經驗是非常奇特的，而我的閱讀都是透過中文完成。這是一個特別經驗。

另外的經驗是一是冷戰，一是六四這兩個原因造成中國內部對西方世界的想像變化與放大。另一是造成外面對中國的想像，某種敵意恐懼仇恨或憐憫，是這樣的，在我的交流經驗當中，我首先突破這個看不見的牆，我如何不代表中國？或如何代表中國讓人們瞭解不一樣的中國，這是我想說明的不同東西。到現在為止非常感動的是，一是所有的經驗，對我個人生命到學術的影響，也很難細數，非常巨大。另一方面，非常感動的是受到中國以外的朋友們由衷接受，到二月份時我的第四本韓文翻譯將出版，然後，也出版了日文、英文、西班牙文、德文的在翻譯中，這表現了一個不是在這（炫耀）美善對我的關注，而是大家都渴望用能認知的方式認知中國，我覺得我好像在做這樣的一件事。

接下來是我以為光興希望我談的。我覺得套句中國老話，讀書做學問不外乎是破萬卷書行萬里路，我覺得就是多讀書多去看，對我來說比較具體、比較長的走出國門就是，九四年去美國大概一年的時間，十一個月的時間在美國，那個經驗到現在為止對我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則是能不去美國就不去美國，因為他不再給我新鮮的刺激或是新鮮的經驗。當時非常重要，重要是兩個東西，一是到美國後我發現在日常生活上的一種無知，我被放置到一個無知的狀態中，比如說當時沒有詞來翻譯 credit card（信用卡），social protracting number（社會安全密碼）。沒有這串號碼沒辦法決定我在美國算一個人等等，或說金融制度，比如說買五分錢醬油也要借帳？為什麼我們要為五十元美金討論半個小時的分

期付款？就是這樣日常經驗的完全不同，讓我意識到所謂社會主義內部和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的文明是何等不同。

當然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到美國後，最強烈的感覺是，那些我以前當作真理來閱讀的理論，或者，至少我當成理論來閱讀的理論，我發現其實是有他自己的脈絡、依據、現實和非常現實的考量。我現在一個很要好的北大朋友它是法國博士他就說不要把德希達（台灣的翻譯）看的太重了，德希達的問題大概是他從倫敦地鐵出來買一個熱狗的時候，碰到一個什麼東西而產生的。那麼，這特別通俗的講法是我這趟美國經驗的最大收穫，所有東西突然變得具體和相對，英文理論所代表的強勢沒有改變，但對我來說，變成非常相對的也是美國經驗讓我開啟了一個好玩的交流。

每次到一個地方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回國以後會有個矯枉過正，會有錯覺。比如說第一次從美國回到中國時，現在想想那時我變得很糟糕，會用張愛玲的語言講中國的歲月，因為在美國的時候，你看到那種對中國的無知，那種敵意、那種定型的想像。你開始覺得你的生命經驗是不被理解、不被接受，所以，你只好自己闡釋自己的生命經驗。幸好很短、很快，我意識到已沒有所謂世界之外的中國，所謂的中國經驗、中國的歲月，其實是在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衝擊反面中發生的。

另一個矯枉過正，就是我到美國後，對美國學界產生深刻的同情與憐憫，一個是感覺她們好辛苦，這兒真的有一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東西，因為那個時候我拿幾百塊錢，可是我真的幹了不值幾百塊錢的工作，而美國的學院是殘酷的剝削。另個同情是，美國學院的激進、美國學院的批判，其實是一種文化留居地中發生的事實，就像猶太人的留居地，印地安人的留居地，大學則是現代社會的文化留居地。這些學者在大學裡頭就很激進很批判，但是，她們跟美國社會不發生任何關連。學術著作是寫來評職稱的，還有督學為了要評職稱的人讀後再寫，是在這樣的生產機制中發生。我以前很反感的是中國的學術不純粹啊，中國學院太多社會干預，或者，太多干預社會的熱情，那時我突然覺得這個東西太寶貴了。所以，回國後我就開始上電視台，參加廣播然後一度被諷刺說，見戴錦華很難，但是，打開電視就看到了。過段時間後我意識到有種東西叫大眾傳媒，這種媒體是可能變成工具和武器，但是更多的時候，只是提供一個新主流的或教學對象的公器，矯枉過正的結果，就是我拒絕出鏡、拒絕出面、拒絕大眾傳媒。

好玩的是，這樣的不斷調整，這是你的外部經驗，讓你不斷重新認知日常化與自我關注，且是不自覺的自我關注，而這種不自覺的自我關注最大問題，是歷史在地問題會特別經過理論包裝，變成具有世界性的問題，而實際上這些問題固然是全球化過程中被牽連，但同時他也首先要在自己的歷史傳統裡與在地結構中得到解釋與批判。而不是簡單地透過包裝上升到一個舉世皆然的問題。後來，參加越來越多的國際會議，坦白說，特別是參加我們亞洲的會議，有時候非常厭倦，有段時間就不想出去學術會議了。原因是來自不同地區的學者，他們面對的政治情勢、生命經驗什麼都不一樣，但大家使用的理論大同小異，不就是你是傳

柯 (Foucault)、我是德希達 (Derrida)、他是什麼而已，大家使用的好像完全可以通約的理論語言，講述幾乎完全一樣的理論命題，但是他指涉著一個無論如何你都無法了解的現實狀態。這是曾經讓我厭倦的一種，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

特別是在亞洲，我們怎樣看都很像，像新加坡在談的公民社會問題、外勞問題，我就會說你那邊是外勞問題，我這邊是遊民工問題沒什麼區別，但其實區別非常巨大，比如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比如重江二員制說政府的尷尬角色，號稱他是人民政府，這種情況就跟新加坡從專制政府一脈相承、連年不換的狀態，肯定是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覺得就是剛剛光興講的，我沒講出什麼新的東西，國際交流、國際旅行的經驗，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你到了那個地方你和那個地方生活的人們在一起，你和她們交朋友，你和她們一塊兒喝酒、吃飯、吃肉，你瞭解困擾她們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每個問題下面，我們文化研究喜歡說的「情感結構」是什麼？是什麼東西支撐著文化表象、格局跟問題狀態，我覺得這是特別重要的東西。

另一個，我覺得需要特別具體地說的是，九七年劉紀蕙 (Joyce) 請我來輔大，這次經驗對我來說重要性，在很多方面，我就不說那些更一般意義上的。我覺得好玩的是，從那個時候我來台灣，到今天基本上我是在跟台灣各大學的英語系發生合作關係，從來沒和中文系發生合作關係，好像外文系的老師很容易交朋友，很容易討論學術問題，中文系老師好像對我不敢興趣。我只能這麼說，因為我沒有拒絕過，但是，我從沒受過邀請，全台灣大學的中文系，這不是很好玩嗎？因為我是道地中文系出身，在中文系系統中工作，但是接不上開口。這是很好玩的經驗，比如說，我在台北的時候，有人叫我匪諜，也有人說是女匪幹，但是我跑到台南去大家就說我是反共義士。怎麼在南部是反共義士，北邊是匪諜？南部的朋友說的，比較有意思，她們說，因為只有反共義士才能像你這樣滿街亂跑，要是女匪幹，已經被關到靖廬裡去了，或從基隆港遣返大陸，沒辦法這樣滿街亂竄。這跟冷戰經驗是把一些東西剿滅，是因為私帶大陸的東西回來要把他吃完，玩笑說要剿滅匪貨，類似這種日常生活經驗中，冷戰的真實狀態可被體認到。

九七年過來經歷很多很多事情，我對於台灣本土化運動或者台獨，我覺得有了理解跟體認的可能。就像在香港九七到底意味著什麼？在香港社會中人們怎麼感覺九七？如果不到達那邊，完全沒有體認的可能，現在年輕人的交流也是這樣。她們夏天來了，說（這邊）有很大的敵意，因為我的學生大概也是批判奧運會，但是，他受到台灣同代人的反映是把他嚇到。接下來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我一直是中國大中國的批判者，中國主流文化的批判者，但是，有時候你就會突然被認定是中國代表，有時候又會有充分的必要性與正義性需要去護衛中國，因為中國被認定為社會主義的象徵或某種基進主義，或者另類可能性出路，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來護衛它。當我學生跟我講台灣經驗時，就喚醒我的經驗，因為我已經不太能感知這種經驗了，這個經驗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知道為什麼我們的位置是游動的？這是一個後現代的說法了，為什麼你的位置是相對的，為什麼你必須滑動？有些人在國外，面對冷戰或現實結構中的敵意攻擊，他就真的變成個民族

主義者，或中國政府發言人，回去跟政府產生了水乳交融的合作關係。

作為一個批判者，文化生產者、思想生產者，我到台灣來沒有預期到的是，在台灣我第一次感受到第三世界的作為真實性存在，而台灣其實是很難作為第三世界，在我看來台灣其實不是第三世界。但正因為台灣是第三世界中的非第三世界，當時遭遇到一些做社會運動的朋友，他們對東南亞、亞洲其他運動界的聯合與支持，我第一次發現我小時候所受的國民黨教育，包含了巨大的真實，有部西班牙電影《陽光燦爛星期一》講西班牙失業工人的一部電影，失業工人中有一個俄國的前銀行員，因為在俄國失業跑去西歐在西歐又失業但西歐的工廠又跑到東歐去，他講一句話是我經驗的喜劇版，他說你的國家——蘇聯一直在撒謊，一直在騙人，俄國人說：對啊！關於蘇聯的事說的都是假的，但是關於你的事，說的都是真的。就是關於資本主義世界說的都是真的。

我到台灣後才知道我小時候受的教育、灌輸以為是欺騙的，關於第三世界的苦難、第三世界的抗爭、第三世界的絕望，原來是真的。始料不及的是，台灣的經驗讓我打開了對第三世界的視野，重新引向社會運動的關注，並且讓我強烈地意識到中國曾經擁有過世界，就是第三世界。我們所謂的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其實是意味著朝向歐美大陸打開門。這經驗對我來說，是重要的轉折，之後我就非常有意識地，在可選擇的情況下，選擇第三世界而不是歐美世界，選擇準學術或是非學術交流，而不是學術交流，作為我國際旅行或是國際交流的經驗。這樣就有機會去了亞洲很多地方，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也去了非洲很多地方。我是一個革命的同路人或是一個志願者，以志願者的身份來參與思考觀察國際運動界的活動，然後，也嘗試開始打開自己的社會身分。當初是因為七十年代歷史反抗，我們是學者，我們是純粹的學者，我們拒絕承擔社會義務這個時候：這時是我稱之為向左轉的一個過程。姑且這麼說，是一個向左轉的過程在發生，而且，也一直在發生中。

第三世界的思想經驗對我的學術產生很大的衝擊，這個衝擊不是直接的。我曾經有個幻覺，如果我們對歐美理論單純的批判感到某種厭倦、某種懷疑，我們就產生某種幻覺：我們說第三世界有原初、未被玷汙的社會經驗、文化、另類選擇、生命可能。我剛好相反，而是第三世界剛好讓我真切地知道，甚麼叫做資本主義全球化，甚麼是我們今天世界的問題。講個小例子，古巴切格瓦讓書房裡的書架上，看到一本幾乎碎掉的阿圖塞法文本著作，那個震撼非常強烈。我本來以為我可以重新進入六零年代的社會運動經驗或是亞、非、拉運動經驗，來獲得對六十年代的歐美理論的反思，或者重新進入的可能，我其實發現所謂六十年代的拉美游擊戰，或是拉美第三世界的社會運動，儼然是西方理論的一種實踐或是反抗。

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沒有一個現成的不論在第三世界或西方世界，沒有現成的經驗，或可能出路留給我們，無論是思想的還是社會實踐的。所以這個工作必須加在自己的肩膀上，必須自己去做，可能我們並不勝任可能我們是自不量力，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對西方對世界狀況，對自己所處位置的自覺，反而使我產

生了一種我們應該執著，我們可嘗試去做。我不必說，德希達（Derrida）沒有做到的事我就做不到，但是我也未必就要重複德希達（Derrida）的工作。開個玩笑：我對學生講一定要多去聽成名學者的講座，因為，他如果講得好，你就很有收穫，他如果講不好，你就增加自信。我覺得鑲在國際學術場域中，就成了這樣一種生命經驗，有時候會碰撞出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如果沒有碰撞出有趣的東西，我不會失望。原來就不可期待別人，而是我們要自我期許的。

多說一句，二〇〇〇年以後，我一方面是進行第三世界旅行，一方面是把英語世界，新的人文社會出版物進行系統的閱讀。這是從開始教書後，沒有做過的事情，就是把寫作都停頓下來讀書。讀書的結果，簡略地說，很多東西因此阻塞或打開。但是，一個很簡單的結論，是我們現在所進入的國際狀態，很像是法國大革命，至少在文字，在我閱讀當時人撰寫的大量文字和我們現在的體驗，我覺得非常、非常像法國大革命之後，將近兩百年的歐洲，那樣的氛圍，大失敗、大審判，其實是革命成功，即是革命之後的狀態。整個世界已經也勢必進入一個思想瓶頸的狀態，那麼，突破思想瓶頸是我們共同的工作。我真的覺得歐美世界沒有任何優先權，另一方面也可能我們無法突破，因為這不是一代人可以蕪獲。但是，我們累積我們的工作，而我們自己也許都不知道我們的工作意義是什麼？可是這個累積關連整個世界的格局，當新思想資源創造，當新的烏托邦形成，烏托邦代表的上升性的政治力量達成時，現下毫無意義的工作，也許就會顯現出它的意義。這就是我的思考，謝謝。

何春蕤：我確實如光興說的，焦慮了很多天，因為不是很清楚這個題目要講什麼，後來我決定從一些不同的角度來講學術交流對知識的衝擊，我想講四樣東西，有兩樣和性／別做為一個機構和團體相關，有兩樣和我個人的出國交流經驗相關。

我自己覺得我個人的知識框架變化最主要來自台灣的社會運動而不是來自學術交流；不過這樣說也不完全正確，因為性／別研究室作為一個機構，它最著稱的兩個學術交流活動都是結合學術和運動，相互對話，相互學習的。換句話說，學術交流可以不只是學術人的交流，而也是學術人和別的主體的交流。

一九九六年第一次辦四性研討會，現在回頭想起來很有意思，當年雖然已經依稀看到很多學者在做性／別領域的論述，但是四性研討會大概是第一個讓這些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跨領域的針對性／別相關的議題進行交流對話的場合，這也使得性／別研究開始在學術上有了一個可見的能量，不再讓醫療公衛的權威觀點壟斷這方面的論述。四性研討會一共辦了六屆，橫跨了性／別議題在台灣社會逐漸建制化的那幾年，對於搗動性／別議題的熱度大概有一些開疆闢土的貢獻，更為本地同志創造了一個友善而支持的學術空間。後來其他學校也開始辦理這類會議，我們決定四性已經完成它階段性的任務，可以暫時休息了。不過，我們最近都還在校內的某個高層會議中聽到有理工領域的主管說：「性別需要研究嗎？那是個學術領域嗎？」顯然這個學門的正當性好像還沒有普及到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寬廣的地步。

四性會議是公開向外徵文，主題比較多元，但是我們還一直希望能有另外一種更有戰略性的國際學術交流，針對某個特定議題討論，藉此衝出一些本地還沒有人在做的、爭議很高、有挑戰性的議題，這就是接著開辦的「性／別政治超薄型」學術會議。叫它「超薄型」，其實是表明我們的某種女性主義立場，說這個會議像女生用的超薄型衛生棉一樣，吸收力很強但是體積小，也表示我們不怕髒，不怕羞恥，要用這個會議來面對看起來難以啟齒的議題。當時我們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出自女性主義激進觀點的活動。我們辦過七屆超薄會議，第一屆請Cindy Patton來說「酷兒」，當時台灣還沒有人做這些理論方面的奠基工作，第二屆我們請酷兒理論大師Sedgwick過來談酷兒理論；第三屆、第四屆我們選擇的主題直接相關當時台灣同志運動裡出現的非常嚴重的性別問題，也就是當時CC gay和T的困難處境，因為在性別表現上看起來太符合刻板形象的主體受到很多排擠，這可能是受到女性主義性別論述的影響，於是我們請的外國學者以及我們所發表的論文、我們討論的主題，都直接針對這樣的問題，把CC gay和陽剛T的話題帶到這個領域裡來談。之後就直接連續辦了兩屆的跨性別會議，請來Feinberg和Jamison Green這樣的知名跨性別主體，讓跨性別議題得到很高的可見度。二〇〇七年的超薄，我們請來Laura Kipnis談「色情無價」，直接挑戰台灣的刑法二百三十五條（235）和兒少法二十九（29）條對網路言論和圖像的箝制。下一屆應該是以「兒少保護」為主題，這種國際交流最終都希望對本地的性／別政治熱點提出理論的挑戰和挑釁。

為了不讓這種國際交流失去本地的考量和需求，我們都會事前先翻譯外來的著作，然後加上本地學者的闡述，用本地的問題意識去說那個理論有什麼意義或重要性，這樣生產出來的知識才能切合我們介入本地的需求。另外，邀請來的外國學者也會被放到運動的圈子裡去和本地的運動團體對話，所以超薄會議的第二天一定在台北辦一個場子，這樣創造出來的學術交流場景，其實不只是人跟人的碰面而已，我們在結構和脈絡上也做了一些努力和設計，希望把本地的議題國際化，也在本地的問題意識和爭議辯論中注入一些不一樣的國際論述。我覺得超薄的國際學術交流是有介入性的，它直接的介入了本地的運動論述和爭議；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本地議題的形貌能夠衝擊到國際學者，促使她們跳出西方觀點的侷限，得到另外一些認知。這方面我覺得我們做得還可以。

性／別研究室作為一個機構還有第二部分的國際交流，那就是持續接待短期研究的國際訪問學人。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就有一些外國博士生和我們聯繫，希望能和我們連結，到台灣來做和台灣或中國相關的研究。通常只要協商好一些實質上的細節，例如對方需要何種資源和合作，我們可以提供圖書館和校車服務等等，就可以發出邀請信了。從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為止，有十個人次，大部分來自美國，有一位德國、兩位印度，還有一些是華裔在美國讀書的學生。這方面的國際交流主要是思想的對話和刺激，他們做的題目都是跟同志文化、性的文化、或者性別議題相關，有一些人留在台北研究，有些會住在中壢，和我們互動比較多。我們之所以願意做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希望這些做台灣或中國研究的人能夠對

台灣的認知不是只有主流的那些，而能夠知道我們的存在，同時我們的研究經驗也可以幫助他們確認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題目，他們則幫助我們擴張我們對議題的認知，充實我們對不同文化脈絡裡的性別政治。

這兩方面的國際交流是性／別過去這十幾年累積起來的成果，我們也覺得很不錯。至於個人方面，我想從兩個方向來講。第一個方向，我跟幾位老師一樣也有國外的講學經驗，但是跟他們比較起來比較不幸，因為我的講學經驗是在二〇〇三年，那年我才到日本不到一個禮拜，動物戀網頁事件就被告發，因此我在日本的五個月時間裡，一方面要完成我的工作，就是做五場系列演講，每一次都要寫好英文稿子讓她們翻譯成日文，最後希望能夠出版一本書，現在書稿是好了，不過好像日本現在經濟危機很嚴重，所以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版。另一方面我又要處理台灣跟官司相關的所有事情以及論戰以及連署以及串連，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非常感謝日本 ADSL 的速度，是真的 100MB，常常可以掛在 MSN 上，隨時可以連絡助理和朋友處理事情。在這次的國際交流經驗裡，一方面我的心思在台灣，一直在處理台灣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因為身在日本，畢竟還有某一種距離感，它也能舒緩台灣的震動。我完全同意戴錦華和陳光興所說的，移到了另外一個文化情境當中的物質性裡，你所呼吸的空氣，你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其實都對你很多原來習以為常的東西有非常大的對比效果，會讓你原先熟悉的東西變得比較不那麼熟悉、不那麼習以為常。這部分我覺得他們講了很多也很精彩，我就不多講了。

最後我要講一種特別的國際交流模式，就是團隊出訪。2008 年我們透過五年五百億申請到經費，也約了運動團體的朋友，第一次用團隊的方式出去交流。我們當時在飛機上面巧遇台大的張小虹教授，張小虹說：「哇！性權派全員到齊。」我們那時候也笑，我們應該分批飛，否則都在同一班飛機上，萬一出什麼事，台灣的性權派就全軍覆沒了(全場大笑)。這個團隊出訪的經驗對我們來講很重要，雖然我們在同一學校同一大樓，也經常見面講話，可是老實說，我們對話談彼此研究的時間不那麼多，通常都是假設依稀知道別人的想法。可是這一次團隊出訪，當一排五個人坐在北京大學風入松書店裡，從各自的角度去談台灣的性權或者性別議題的發展的時候，我們第一次清清楚楚的聽到對方的看法和思考。到了異地才在跟內部的人交流，那個感覺非常特別，而且很興奮，好像青少年的時候參加營隊一樣，同進同出，不斷討論，心情亢奮，思想熱絡。

回到台灣以後，丁乃非急著問我們下次什麼時候還可以出去，因為那種感覺是很棒的，在國際交流中交流的其實正是自己人，我們不單單在跟別人講話，我們也在跟彼此講話，也在磨礪彼此說話的方式，也在交換我們彼此從不同角度對一個議題的不同的看法，而且也因此生產出新的論述累積。這次去北京和香港總共就開了五個公開的場子，留下大約十萬字的記錄，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未來的持續交流勢必會繼續。像這一類型的交流，我想可能也可以是一個新形式，就是它不再是個人的講學，它是團隊的切磋，這個過程當中學習到的東西其實很寶貴，交流出很多新的火花。這部分就是我今天提出來一些報告，謝謝。

羅永生：謝謝光興，不過我講完還是要講一句，這次來錯了。為什麼呢？就像我在前兩天會上所講的，從香港經驗來說，我們真的能夠談的，不是今天會議題目最主要部分是知識生產，因為我們不搞生產，我們搞消費的，我們只能從知識消費角度來談，消費這個東西不能跟生產分裂，消費也是生產，生產也是消費，就是機制再生產。另外一個比較難跟上一場接的是，因為學術交流對香港做學問的來人講，好像是一個不能夠思考的問題，因為香港每天都在交流，任一方面都在交流，沒有交流在香港是怎麼樣子，是不能想像的。這個東西已經近於不能反思的層次。我們每天都在做，而且，因為每天在做，沒有一個反思的空間，究竟我們在做什麼？

我談這個問題是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現在要談怎樣面對不斷擴大的國際學術交流時，在香港沒有自己作為知識人的參與在裡面；每次聽到學校跟你講我們要怎麼擴大學術交流時，是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在裡面的。我們究竟需要一個怎麼樣的交流？怎麼樣的知識生產方式？完全是沒有能力決定的問題。所以，就變成交流每天都在進行，但是效果如何是的確要想的。跟上一節不同，我要給大家一個反告條，因為我談的問題層次非常低，我們就像面對交流每天殺到我們門前你想逃也逃不了的一個狀況。因為過去這幾年，香港大學院校搞交流已經到達一個程度，以前我們原則上看到很好、很好，但是現在你看到就是每一個課裡面都有外籍生。

在我們學校裡面，外籍生主要有幾個類型，一個是非常龐大的交換生（exchange student）計畫，主要是本科系型的，譬如說，每年參加交換計畫的是本科每年的四分之一，目標可能是一半，將來所有同學都應該出國。這是我們科系裡面面對最大的問題，你把學生送出去你就要收其他學生，所以，我們現在面對大的問題就是，知識生產及知識再生產的過程中，你面對已經有的大堆知識，怎樣來設計課程與怎麼教？是很大的問題。但我說香港經驗的時候，有時候做個（qualification）保留，香港為什麼這麼熱衷去搞交流計畫？因為香港有一個從行政角度來說，是以為自己有英語優勢，所以，我們可以透過英語來操作所謂國際交流計畫，很多問題就是因為這個名不符實的英語化所帶來的。以前我們的語言主流是英語，我們透過閱讀英語教材，然後，讓所有香港學生接觸到國際學術水平，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你閱讀英語，要求學生閱讀英語，但是你討論可用廣東話，討論是用中文，香港向來是這樣操作的；現在你要把其他非本地的學生也請來，就假設我們可用全英語來操作，這是最大的困難。

我舉一個例子，有門課叫作「中國思想史」，以前中國思想史一方面有些英語教材，一方面可以更新（update）中文教材，比如說戴錦華寫了一篇文章可以立即用，現在不行啊！因為，在同班裡面有完全不懂中文的學生，那你要怎麼國際化地更新（international update）給他呢？這些「中國思想史」的最新、最好的東西，你就不能了。然後，同一班上有外地學生有國內來的學生也有本地生，語文的問題，光興說我們談「華文國際」的問題，而「華文國際」本身也是很大

的問題；甚麼叫華文廣東話在華文裡面的位置是怎樣？出現這個情況是香港很多學生對國際化不滿意，因為有外籍生迫使他們要講英文。這個問題是，反對英文可以，但是，你贊成怎麼樣，不用英文，用中文？跟學生說我們用普通話上課好不好？學生都反對，因為對香港學生來說，與其強迫講普通話，寧可講英語。所以「華文」在香港的交流大環境裡，出現了很多問題。

另外，就是牽涉到課程的問題，香港一向都有跟外籍生交流的傳統。比如說，我二十多年前在中大讀書的時候，某些學系特別著重提供外籍生亞洲課程；亞洲課程是專門為外籍生設計的，所有外籍生都要修亞洲課程，亞洲課程讓他們瞭解亞洲，那些課程是英文的，本地生沒有讀這些課程，那時候也有這種交流。但是，現在擴大全英語交流的假設底下，所有課都打開，所有課都可讓外籍生來修，面對最大的衝擊，是所有老師以前教學經驗很多年教某一門課時，是某一個英語寫作的部分，加上本地歷史本土話題，這些經驗現在不行了；因為，是全英語操作。反思全新的教學環境究竟產生什麼效果？不被特別影響就是理工科、工商管理學科，因為他們的知識就是（universal）普世適用性的，所以對她們來說從來沒有想過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所有有文化背景有脈絡（context）的知識，現在都有很大問題，一個課程用什麼教材怎樣教，所有關於脈絡知識（contextual knowledge）有關國際交流的問題都成為普世知識。對於我們，譬如說文化研究課程來說，我們要非常努力去區分某些課教的主要是基本概念、基本理論，用全英語外籍學生來的時候一樣可以用，就沒有問題，有些課可以用國際通用教科書的，那我們就用這種教科書來教，調解本地學生與外國學生（一起上課）對她們的功課要求應該有沒有什麼區別？這種課，一般來說，不太受外國學生歡迎的，因為在外國他們有機會學，她們來的時候常帶著對東方的好奇，對中國的好奇，對香港的好奇，她們要來選修香港文化構成一門課。來得時候就麻煩了，她們想瞭解香港文化，我們怎樣教呢？不能教啊。

但這也不是所有人的問題，因為，的確是某些學校某些學者她們有一大堆已經經過英語出版（publication），已經可以作為豐富的教材，用這個東西也可以。但是，另一些老師的經驗不是這樣，他要放棄一堆跟本土相關、比較強調地域性特色的專題，這有很大的矛盾，人家來就想瞭解地方、本地性知識，但是我們提供的完全不是這樣，所以就利用麻油地那個學校所用的教材，譬如說，剛才我提的中國思想的課，可提供一些老師用英文去教，但是他用的教材大多是外國漢學的東西，但用漢學東西來教中國本地生時，學生就會問，怎麼連孔子都要用英文講啊？作教師你真的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些問題。另一個我想提的是，剛才提出課程內容，要想出一種可以符合不同來源學生的課程內容，有一種方法是把課膚淺化變得很淺，每個人都懂一個美國學生來對中國國情完全不懂的，教他中國ABC。一個學生從北京來的對中國的事都知道，就問你你怎麼都教這麼淺？我不淺不行，你就要把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拉一個平均數，是我們操作的一種方式。

不斷擴大國際交流的巨大影響，把我們教師的目標都模糊以前我們可以達成

目標 (well-target)。現在因為學生來得這麼多，我們根本就不可能調解，當中的差距不單只是剛才提的語文差距，還有文化背景跟水平差距。有些來的時候，會說你講的東西實在太淺，他是從美國菁英 (elite) 學校來的，但是我們以往收的，都是平均之下的學生，水平差異非常嚴重。另一個我們從教學經驗裡面，覺得有很大挑戰的，課堂上就算沒有外國學生，同時有大陸學生跟香港學生的時候，教香港文化課程，對大陸學生要引導他改變對香港既有印象，但對香港學生原來的教學目標，是要反省自身文化的問題，這兩個東西不能混在一起。要本地生反省自身文化，大陸學生完全不知道你講什麼，你要改變大陸學生對香港的某些刻板印象，你加入某些東西進入課程，就是激起香港學生對自己的錯覺。每個學期我都在調整焦點，怎麼把他變成比較有生產性的我現在還沒有方法，看來要開一個研討會來檢討這個東西。

最後，我想講一點，有關研究生我講的就是本科生，研究生沒有那麼大的問題，因為，研究生主要不是靠講課，所以我們會個別對待。但出現一個從知識生產來談的問題，我們缺少一種主體性意識，包括研究課程應該朝向怎樣的目標，這個差不多是沒有的，沒有的效果是怎樣呢？我們每年收到很多大陸學生的申請越來越多，學生背景越來越好，對我們的興趣越來越大，你發表過的東西他都讀過他就寄信 (E-mail) 來跟你討論你的問題，學生很難不收的，所以，很容易就收，但是長期以後，他們有興趣的問題，其實不是香港的問題，有興趣都是大陸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只在文化研究，在社會學更嚴重，香港社會學比較有反思能力的的朋友都喊：香港研究已經衰弱了！大陸本地學生要是想著他將來的前途，他大概也不做香港研究，而是做中國大陸研究，因為他的角度較容易。大陸學生來的也是搞大陸課題，我們在香港教書，教大陸學生帶他們搞大陸課題，當然很自在囉！我們有理論，他們提供材料，也許，也是香港從來沒有反思過的一種知識生產模式，一種買辦模式。我們提供理論，我們提供一些因為你們讀英文可能還差一點，所以我們提供一些理論，帶你們去搞大陸研究，狀況我們不一定很瞭解，但大陸能夠提供材料的話，拼合理論還可以過關。當然我們不能一般化 (generalize) 這個狀況，我們現在收的大陸學生，總的來說，畢業得還不是很多，我不能說每個都這樣，但是，趨勢不去改正，就會變成這樣。在這裡我只能拋出這幾個點來，作為拋磚引玉。因為你們要的不單是操作問題，還有理念的問題，我想香港的經驗在這方面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陳光興：你講的就是我們想知道的狀況。

劉紀蕙：我就試著講講看我們這邊的經驗，在這之前當然光興想要我們來談這個問題，是有一個可能的期待吧？就是清大、中央和交大可以有更體制化的跨校文化跨校學程，可能在進行中，如果說，有一個在中央之上清大之上交大之上有一個跨校委員會、一個國際中心，就是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或許收到的某一些學生

可以在三個單位各自的特色之下，選擇他們希望完成的學程（program）完成了學位（degree），可能更有自我組織的彈性空間，我們也曾經講過可能光興可以去組織這個跨校的課程委員會或國際中心，我們各校就自己經營自己的特色，特色我覺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所謂的特色我覺得也牽涉到所謂的知識對象，或執行知識研究、生產的研究者，他自己需要什麼或問題？光興給我們一個工作，我是把他印出來提醒我自己一下：如何經營一個文化研究學程（cultural study program）？面對不但是本地生研究生的知識生產問題，研究生之間如何互動？

當然我的起點是先要思考做為各自的研究群，我會設想交大社文所是一個由特殊研究群體構成的學術單位，課程組織會隨著研究群體各自執行的研究計畫、發展而發生變化，我們不太可能像剛才永生說的我們提供一個普世性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我覺得不太可能我們老師們，總是不肯放棄課程隨著自己研究走，所以學生就在抱怨這個太難了，你們給的理論我沒辦法找到我的研究對象，可是我們時常提醒學生說，老師的研究和老師思考資源和老師的問題意識，可能會提供同學們一些啟發，可是學生的研究對象一定要自己去重新尋找、重新去思考，理論思想和研究對象與脈絡之間的距離，如何去拉近，要每個人自己去處理。

不過，過去的確是，我們在預想或許會有不同地區的學生過來，到目前為止我們一定會強調要有中文背景，不管是歐美或是其他地區，我們現在覺得非常謹慎，我們跟中央的條件不一樣，當然，我們希望國外學生要來，至少要有兩、三年的漢語背景，可能是漢學研究者願意過來。當然也有大陸來的學生，過去也有兩三個，在課堂上我們剛好在討論東亞現代性裡政治概念的重新探討，有北京清大同學來跟我們交換一下文革經驗，或是，白毛女的詮釋問題，或者，像去年剛好有四川地震，剛好在課堂上就有很多討論。日後一定會有越來越多交流的可能性。還是，回到我們怎麼去規劃課程？像我剛剛講的這必然是在地化的，而且有研究者自己關切的，不管是理論脈絡或是問題意識研究對象的選取，在課堂中間展開，我們這個所有個特色，光興加入後也相當好。

我先從後面要講的，我們目前有的中長期研究計畫，就是每個老師提出來的也希望這中長型研究計畫可以跟大陸比如說上海大學，他們有十年計畫或跟北大、北京清大有某種合作。我們大致範疇是東亞現代性的知識構成和民族國家所影響的現代性問題，每位老師包括光興或我、朱元鴻或念政治哲學的林淑芬、文化史的邱德亮、思想史的魏德驥。我們非常靠近，因為過去五、六年陸續辦了讀書會，比如說探討事件的概念、探討政治概念的重新檢討、思考，探討戰爭內戰和平中間的關係，或者，探討生命政治的問題。過去幾年辦的研討會和今年要辦的研討會，就會隨著這些讀書會。當然我們讀的是理論性的問題，可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永遠是東亞的或是中文世界的問題。不管是東亞地區、第三世界精神構造，（這到底是誰的題目？可能是光興的題目）戰爭、生命政治、歷史書寫或戰爭、內戰、國家暴力，或集體記憶和情感結構，或是東亞現代性翻譯和某種心的概念的轉折，或者主體和倫理視角之間的關係，從民族國家到後民族國家。

這些老師們關切的問題，各自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可能七、八年的研究計畫，慢慢會在課程中間出現。譬如說：我們的課程會有幾大類，要說是議題性的範疇的話，可以看出來一個是台灣文化，裡面會有台灣殖民時代近代性的問題，皇民化運動跟皇民主體的問題，或有老師會開台灣次文化、通俗文化、視覺文化、影像文化。另一個議題性的是東亞現代性，老師會開亞洲的思想資源、魯迅和文化批判、陳映真光興會開，或我會要去開亞洲現代性跟倫理問題的重探或政治性重探，或是，殖民思想的問題。另一個範疇是，文化史比較研究，譬如國家史就是民族國家的問題，或是殖民史問題、帝國問題。

當然這些看出來我們所裡，持續出現的是理論性的課程，理論性其實有幾個特色，我們所大概就是能力不足，不會有像中央這邊有清楚的性別研究團隊，我們比較靠近政治思想的重新思考和理論深化的軸線。所以，有關國家暴力和意識型態，或有關主體和他者，或某些理論家的專題，包括這個布迪厄 (Bourdieu)、布希亞 (Baudrillard)、傅柯 (Foucault)、巴迪烏 (Badiu)、拉岡 (Lacan)、瑟鐸 (Certeau)、洪席耶 (Rancie) 或克莉絲蒂娃 (Christiva)，他們其實看起來是所謂的後現代思想，我們會提醒同學理解這些所謂後現代思想家他們真正面對的是一個知識和思想被資本化和統合化，被統合化 (totalize) 後如何被重新打開，重新打開後的工作，常常是重新思考和反省政治性 (polis) 的意義、政治 (political)、警治 (police) 和監控 (policing) 的問題，傅柯這邊非常清楚從監控 (policing) 到主體化 (subjectivation) 的問題，或主體化如何讓美學政體化或思想被感官、被政體化。

要讓同學們能夠隨著這些思想家深刻地反省理解他們思考、面對的西方社會和歷史的問題，然後同學們必須要自己回到中文的脈絡，重新去處理中文世界的一個主體化問題或是現代性國家主義之下主體的問題、倫理問題，倫理如何被國家化，或是政體化，或者美學如何在國家生理化的想像中成為另一種政體。同學們的題目呢？舉他們在作的論文，前兩天曾經提到，我稍微歸類，一個很大的類別：是他們會回到中文脈絡的歷史論述，重新把文化意識型態問題化。關於日治時期，我曾舉過一個案例，好像大家以為是戒嚴後，國民黨政權滲透進行國家管理，可是其實是在二二八之前的一場疫病，使得台灣在日治教育下，經過整套保甲制度、衛生制度、警察制度，之後要求國家公權力介入管理人身體的出入。這是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在二二八之前的。

這一類的，或是說討論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七間，整個大陸過來的左翼知識份子、國民黨政權內傾向左翼得知識份子，即那些在政府工作的。或是，在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留下來然後持續，會有好多論述發生，這個論述發生過程中，去中國化、去日本化、再中國化這些論述如何發生轉變？同學們就不會害怕去處理一個歷史性的問題，當然更有能力去處理八〇年代、九〇年代以降的《島嶼邊緣》、客家論述、同志論述、黑名單工作室新音樂的生產。或是，去處理一個發生中的文化活動和社會現象，如何去分析思考和理論化現象，所以，有人去討論快樂丸的問題、博物館內外不同的地方感、或彩虹橋，一個文化政策無法著地、

寵物消費論述的生命代價。

第三類就是從文化現象轉移到文化政策生產的機制，去檢討社造運動、連鎖店、無線電視政治經濟分析、有關貧窮的新聞報導探討這類。我們的學生，第一年進來很高興，第二年到第三年開始陷入嚴重焦慮和憤怒，上了這些理論課，可是論文題目還是沒有啊！我知道有修同學來修過我的課，覺得嚇壞了快逃走，因為離論文距離太遠了。我隨時要提醒學生，論文對象要自己去找而且要持續地進入檔案的，所以，有同學到了第三年開始恍然大悟他需要開始看六零、四零年代的報紙，甚至有同學三年級才開始學日文，四年級就把日治時期電影文化論文寫完，然後也交了日本男朋友，整個過程是非常辛苦，當然，我們還是一定要提醒他們四年、五年之內一定要畢業，這過程是辛苦的。

我們在構想日後的合作，不管是香港或大陸，或其他地區的學生要過來。他們的研究問題，一定還會跟她們的文化歷史脈絡相關，當然也可能因為台灣有些現成的資料檔案，大陸有位同學到台灣後就整天泡在國史館、檔史館，想要做重慶時期的新聞論述，一定還是要回應自己的問題，只是，台灣可以還是可以提供某一種相對性和參照。我們自己要提供課程，我們首先也不能放棄自己的問題意識，因為我們的時間非常有限，不能提供非常服務性（service）的課程，好在我們不是本科的基礎教育，我們就是碩士班、博士班，我們頂多就是開一、兩門課，一門半。我們老師都是一門主要隨著自己研究的課，然後鼓勵同學在那門課完成自己的論文，我們有位從俄國來的同學，中文非常好，好像在哈爾濱念中文，她要作的還是自己蘇聯解體的某些問題與台灣相對比較。

具體地想像合作怎樣可能？首先是不能放棄作為研究團隊與學術機構，或作為研究者自身關切的問題，這是持續、不能放棄的。可能往後十年，我教書的東西還是會慢慢變，有興趣的同學只能跟著我來讀點東西，可是，還是作自己的研究。我也曾經想過怎樣能夠更積極？例如我們的學生對於大陸北大、北京清大、上海大學、華東師範的某些課程很感興趣，因為，有些人正在做五四時期的問題，正在做晚清到五四之間的知識份子，某個知識份子叫做朱謙之，他的無政府理論，他又有佛學基礎，然後，西田幾多郎的脈絡，又活躍在晚清到民國初年。她們自己會找到一個非常奇怪的研究對象，會有某些自己的問題感，就回到那個地方，當然非常辛苦，怎樣面對中文系的挑戰，怎樣面對中國哲學的挑戰；可是必須要自己去完成，也非常希望到大陸去聽一、兩門課，跟某些學者或同學對話。

我曾經跟王曉明的學生提到，這是最近才想到，我們可以更積極地在我們課程規劃好後在下學期之前，彼此主動公告，可能有些隔年要來的就可能提早在下學期過來，我們的同學也是，或許他希望在戴老師開課時跑去聽，比如說族裔思想、第三世界運動，或者汪暉的課，不要跑過去發現汪暉正在雲遊四海。可能不一定需要學分承認，因為學分多半修完了，旁聽課收集資料和參加討論就已經非常好了。另一可能性，是可以持續規劃研究生工作坊，過去曾經有過，在交大辦過一次，在上海辦過一次，學生可以把正在進行的論文拿來交換發表，可刺激彼此的方法論與問題意識。在上海的或許有比較多的底層研究，台灣這邊可能比較

多理論的問題意識，彼此刺激可能會有些彼此的自我調整。

研究者也許也必須彼此刺激，像我聽幾位講話，我好久沒有聽小戴講話了，今天又刺激活化我一些想像與思考，我們研究者大概也需要彼此刺激。小戴說二十一世紀的思想史或是和平運動是值得重新處理的，我們所也是在做東亞現代性，包括中國與日本的脈絡，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包括思想史上的無政府思想當時是怎樣？是不是某種不一樣相對於國家的？相對於國家組織或進化的哪些思考曾經出現，或許，才能提出剛剛小戴提出的挑戰，我們可自我期許做些真實知識的產出和對話，透過中文的書寫，在脈絡下彼此刺激各種研究發生。預想往後在台聯大課程下，我們所可以提供的課程，會越來越多有關東亞現代性問題的重新問題化和理論化，也很可能在課堂中慢慢越來越多大陸、中國某些時期的材料，當然，包括日本。

我常覺得所以會開始這一系列的研究，是因為我們所理解的二十世紀，不管中國、台灣、東亞的二十世紀史是二分之一的，或是，四分之一，或是，八分之一。因為台灣就已經被切割很多了，更別說台灣跟所謂二十世紀初中文脈絡。所以，可能在課堂中間，我們需要去思考某些問題，就需要把魯迅、文革或把某些革命論述放進脈絡中間，也包括日本。整個現代性論述，日本思想對中文脈絡的影響太大，所以，我們也陸續邀請日本思想界的一些學者，包括高橋哲哉、子安宣邦和前陣子川島真。我們也會把他們的東西翻譯出來進行各種深入的對話，希望透過他們對於國家主義化的日本現代性論述檢討，我們跟他們對話，也重新檢討中文脈絡。包括台灣在日治殖民下，不自覺地擁有為自己的思想資源和傳統的，或是，晚清以來，都是一樣地去重新問題化，這是持續去處理的。當然，我們還是會有很多當代議題的關切，全球化之下的外勞，我們有非常多學生親身涉入運動，為自己展開自己的研究，所以，這些都需要更多研究者交流或研究生交流，讓這些研究可能更為活化。好，我就這樣。

劉人鵬：

放在這一場，我好像被期待從學術機構的交流經驗去講，也就是從自己的行政經驗講清華中文系的國際交流經驗。一開始面對題目不知道要講什麼，我就開始回想，想到幾十年前我當中文系學生時，其實我們身邊，就有很多僑生或是外籍生，那時我們有馬來西亞僑生、香港、韓國同學、日本同學；記得研究所時，也曾有外籍漢學家教我們英文。仔細回想：那時候到底怎麼看待這些同學與老師，當時腦海裏對這個現象曾經以「國際交流」來理解嗎？我發現我想不太起來了。我又想：難道只有中文系有僑外師生？當時台大理工科呢？於是訪問一個電機系的朋友，他說記憶中有僑生，沒有外籍生。我問：你那時候有因此感覺到「國際」嗎？他說：沒有耶！我問：你跟他們關係如何？他說：有時候還同寢室，只是覺得很好。我想，那時候我感覺也就是很好，我也跟韓國同學住在同一寢室過，現在只記得她回韓國時，買了電毯送給我，很美的電毯。

我想，會不會是因為沒有白人，所以就沒有國際感？因為亞洲同學長的跟我

們都一樣？當時我到底用什麼樣的框架去認識他們呢？但研究生時，我記得有個美國同學來，印象中跟他們的互動經驗也只是：我們為了學英文，他為了學中文，就交換語言。所謂的「國際感」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對照今天，我突然覺得，「國際化」或「國際交流」在我身上變成一件事，只是從前三年的行政經驗開始，尤其五年五百億後，國際化與國際交流變成一個緊箍咒。

清華中文系很早就一直有海外的學者來，有俄國學者、大陸學者等，過去似乎並沒有必要特意去標誌「國際化」。這學期我們還有一個日本學者來，他很高興地跟我說唐代的中日交流：唐代日本人跟韓國人都來中國考科舉，有個日本人考上了還做官。我們讀先秦春秋戰國，那些思想家們國與國間跑來跑去的，政治婚姻也是這國那國間從不缺乏，國際交流的事情自古以來一直都在進行。雖然不同的歷史時刻是如何不同地理解這些今日視為「國際交流」的事，不容易談，但在我的感覺裏，「國際化」與「國際交流」變成校園裏偏執狂般強迫性的一件事，變成快要失去真實性的一個標竿與口號，只是近年的事。

這幾年形式化的國際交流，有時我覺得是很恐怖很沒意思的經驗，就是在教育官僚機器與知識理想毫不相關的競爭之下，做無聊的事。大約是從五年五百億開始吧，學校就會三不五時塞給各系所表格，要你去填今年度有多少國外學者來訪，收了多少外籍生，三年內你的目標要收到多少？要有多少人次來訪？目標是要有幾門英語授課？中文系面對一些莫名其妙的標竿，經常要填諸如「本系不以英語授課為目標」或「不適用」之類，突顯扞格與無聊，也很生氣為什麼要這樣浪費我們的時間。今天的國際交流，似乎需要先問題化來看待。

面對這一種有點異化的「國際化」，我起先滿焦慮的。在國際化幾乎等於英語化的氛圍裡，中文系要怎麼因應？那時很多人來鼓勵我，當年同學現在是台大老師的朋友們告訴我，他們校長說現在國際化要靠你們中文系了。他說：誰要來台灣讀理工啊？當然是要來台灣讀你們中文啊！所以，現在的國際化要靠你們了。當時報章雜誌在炒大陸崛起、全球華文熱，大家鼓勵我們：這是我們可以拿來當賣點的廣告詞。可是很快我們就一直被問到：全球華文熱的是中國大陸，人家用簡體字，台灣用繁體字，誰要來台灣學繁體字呢？再者，當要收更多的國際生時，你會發現學華語很多是想要做生意，而基本上中文系是號稱要做學術。口號與標竿性的「國際化」跟台灣中文的關係，至少目前為止，還需要更真誠更實際的面對。

2006年，在陳光興全力幫忙下，我們辦了「全球化與中文研究的新方向」國際論壇，那次論壇我們在觀念上主打的就是陳光興講的「華文國際」。記得我們邀請教務長來，他似乎很驚訝中文系也能那麼「國際」，記得他一進會場看到白皮膚的外國人，就立刻講英文，我們馬上告訴他：不是所有國際會議都要講英文喔！那時他的表情真是非常驚嘆。會議邀請世界各地的中文或漢學系主任來，兩天的論壇後，我們與許多單位簽了交流合作協定。其實我覺得後來如果精力夠的話，那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大陸、香港、新加坡、義大利、美國等都有人來，賓主盡歡，他們回去之後，陸續很快地很多單位跟我們聯絡，有什麼會議就邀請

我們，有出版品也會寄來。嶺南大學後續的交流最實質，後來很快邀請我們教師去客座，他們辦了研究生的國際交流研討會，特別留名額給我們，所以，我們的學生去了特別多，也曾規劃一個大學生的訪問團來台灣，希望我們接待（不過後來因為有些原因沒成行）。

其實如果我們精力充沛的話，的確可以打開很多實際的交流。例如義大利，義大利他們對華語教學非常有興趣，那時候有兩個人來，回去後也辦了國際會議，希望我們去參加。可是國際交流如果是一件體制裏的工作，就會很需要體力跟時間、經費，需要很多額外的東西。如果精力資源夠的話，整個交流網做起來也許不錯。可是就真的需要太多額外的時間精力。

交流簽約部分，其實也有滿實質的好處。比方說，我們跟美國堪薩斯簽約，後來我們有個學生得到菁英交流獎學金，她想要去美國，就去我們簽約的學校堪薩斯，申請時獲得對方特別幫忙。現在學生交流，如果要到沒有簽約的學校，就要繳費，就這點來說，其實簽約也是滿需要的。我們學校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沒有簽約，但我們系簽了，這樣也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過去兩年來每個學期都來很多學生，新加坡學生來這邊因為語言相通，他們說：老師你們就不用擔心我們，我們一點適應問題都沒有。有些國際生，對於台灣的歌手演唱會，比我們還熟。

體制裏的國際化，位置不平衡的問題一直都在。就是你要跟誰交往？誰要跟你交往？對等永遠是個挑戰。簽約時，約裡多會說希望對等；可是對等非常難。像我們學生，申請到菁英留學獎學金時，他們最想去的還是美國。我們簽約的對象著眼於實際的關係，並沒有以名校為目標。記得系所自評的時候，一位委員就說：我們跟這麼多所國際單位簽約，彼此互訪，教學積極合作，非常好，值得肯定，可是，他建議「未來學術交流對象可擴及世界一流名校」，認為這樣在實際交流合作中才「更可以學習成長，更上層樓」。我常懷疑，如果人人「毋友不如己者」，到底誰會有朋友。

我們跟嶺南合作，有教師受邀去嶺南客座，要經過三級三審，校教評會上我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請你告訴我，嶺南大學是一個什麼樣的學校？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當學生拿到獎學金想要出去的時候，我說：不一定要去美國啊，可以去日本啊！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學生說：之前沒想過，所以沒有修日文。後來我們比較多宣傳，希望學生不要只想去美國，可以早點修日文或其他語文，後來有用了，所以，有學生就開始努力學日文，申請日本學校。可是當你跟他說：你可以去新加坡啊！我們新加坡也有簽約的學校啊，他就覺得很困難。覺得好不容易拿到獎學金了，當然要去遠一點。去歐洲又考慮生活費比較貴，拿到的獎學金不夠。這都是不平衡的問題。

現在體制裏的「國際交流」像在做業績，像在拉抬自己，過程中常忘了自己是誰。例如曾經有評核委員看到我們師生交流的業績，建議道：國際化、國際交流「不要只在華語地區（如中國、新加坡），其他非華語地區應該列入考慮」。事實上我們的確沒有限定在這裏，我們交換學生，也有荷蘭來頓大學、法國里昂大

學，簽署姊妹系中歐洲大學也有，但似乎他們只想看到更多的歐美，白人及日本以外的國際性，似乎很難被看到。在清華有幾次開會時，聽到理工科教授憂心忡忡地檢討，認為整個學校國際生的名單中，有太多是來自印度、越南等地的學生，他們認為，國際化應該更上一層樓，因為目前來的國際生太多「第三世界的學生」，認為應該要以爭取第一世界學生為目標。「第三世界」被認為是不夠格的「國際」。很悲哀啊，難道他們從不記得自己身在哪裏？

今天的題目好像還包括知識問題，我就講一點點好了。在「國際化」的競爭壓力裏，被迫也好、自願也罷，現在似乎中文系跟漢學界的聯絡愈來愈多了。然而如果「國際」的交流侷限在漢學，而跟漢學界的交往仍然只是仰慕式的迎接，或介紹歐美及日本漢學，或者在既定框架裏，找不到自己說話的位置，並且看不到漢學是在怎麼樣的位置，我不知道結果會不會是邯鄲學步，失其故步。

最後，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小到近乎吹毛求疵但卻是癥兆性的例子，想說的是知識如何被表述的微妙位置問題。巴金有一篇小說〈第二的母親〉，故事是一個小孤兒被叔父收養，叔父有個美麗溫柔的女人，小孤兒稱她為「媽媽」，「媽媽」對小孤兒的一見如故與疼愛，來自小孤兒讓她想起失散多年的小弟弟；然而最後「媽媽」告訴小孤兒：「我是一個男人」，原來她/他是乾旦。王德威很早就注意到這篇他稱之為「奇情」的小說，並且有十分複雜細緻的精彩分析，近年則在幾次演講中提到。2004年的《文訊》有過一篇文章記錄王德威在台大的一場演講談到這篇小說，演講記錄說：「王教授風趣指出在張小虹與何春蕤提出『酷兒家庭』的五十年前，已然有一個酷兒家庭。」這個表述不同尋常的地方在於：漢學家引用台灣學者創新的命名，是以「這在歷史上五十年前就早已存在」的方式出現，在漢學的引用中，不知不覺將在地學者命名的原創性與在地性，轉化成漢學家對歷史更完整的掌握與補充。漢學作品引用西方或主流經典學者，通常會致敬，而少見這種風趣型態（我不確定這是否更與引用的是台灣「酷兒」有關的知識以致如此）。這不是故意的，但卻是在地知識與漢學知識目前關係的一個癥瘕。在交流的過程中，這些微妙處如果不提出來，對知識框架帶來反省與挑戰的機會不大。在國際交流你飛來、我飛去，越來越容易並且越來越迫切的時刻，這個論壇提議談「知識生產」的問題，我想是很重要的。

陳光興：開放。本來規劃請同學講經驗，後來也沒做成。看大家有什麼想講的話都可以不要客氣。

林鎮鈺：我比較晚來，我想前面在談知識的生產和製造，我覺得這裡面好像有知識生產製造、生產消費，中間有個環節是交換的問題，是誰買什麼東西？我進來的時候，是戴老師在講，講到很多有趣的經驗，到各個地方如何被重新命名、重新移作他者，可能會覺得被奇怪的方式認識。還有幾個常常出現的，幾乎是個中心思想就是理論，理論往往是西方的理論、歐洲理論，不管是教研究生介紹西方理論，讓他們研究本土文化，或是，辦研討會。我會覺得在這裡講的話，就是知

識的交換融合時，我覺得要有個媒介，這個媒介其實就是錢的問題；意思是「價值」，某種東西如何被翻譯成另一種東西，可以很快被認識到，理論有點在作這個。這有點回到最後劉人鵬提到的文化的對等，什麼東西被轉換成另一個東西被認識，如果你沒有轉換成那個東西，人家不知道你東西的價值。今天如果非洲有種交易媒介，那是他們的錢，講這個時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東西值多少，但是如果他翻譯成美金。「哦！我知道了，這相當於這個。」老師尤其是處在買辦地位、中間人（middle man）的地位，（某人說：money changer），有點。我的一點感想。

陳光興：這個可以談的很大、很大，可是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而是我們在講這些交流，其實是在朋友們已經累積了大概十幾二十年的關係網絡裡。舉具體的例子來講，孫歌的學生要跑來，我說怎麼辦呢？孫歌的學生就是我的學生啊！我們在講大概都很具體，在這個意義底下，要怎樣合作？從某個觀點來看，這個契機正在出現，以前還困難，有沒有可能學生在指導時，受困於不同網絡裡面的資源，以前很固著嘛？這個東西期待會有積極正面的作用，原來設想的格局（scale）很小，不然怎會是這幾個人坐在這裡？透過這些機會，這個累積滿久。大概是這種狀況。還有任何人想講？雅芳有沒有任何意見，你是博士生。

劉雅芳：我沒什麼特別想法，但可提個經驗。大概在二〇〇七年，去上海參加會議後，認識了上海的老師，進而有些進一步接觸，我在跟他們交流的時候，甚至，後來有 MSN 常常聊彼此學習的事情，以及對彼此的看法。討論到學術時，我覺得可能沒什麼差異，比如說，我們念漢娜·阿蘭他們也念。可是，討論到彼此對應歷史脈絡的認知時，我不懂他的，他也不懂我的。也是因為這樣，我會開始去想些我在想台灣問題、知識問題時，比較不會去想的層面。這些交流是滿有趣的，落實到一些具體的狀況，可能就是在 MSN 上討論到時，他會介紹他讀過的書，我也會介紹台灣的狀況。這次有個朋友過來，他就會把一些書背過來，我也會帶他去找他想要的，這種交流很好玩。

可是，有些問題是在於認知的狀況，比較具體的狀況，尤其是歷史吧？包括他們對於我們的理解，比如說他會常問我台灣的歷史或像上次陳雲林的狀況，我會試著跟他講。我想他可能也不太理解，我講這個會心情不好，也就是他很想瞭解，但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跟他講。我不知道我怎樣講他才能瞭解。他覺得陳雲林在那個位置非這樣做，為什麼你們會去打他呢？甚至，最後他說他對民主失望了。其實，剛剛老師們有提到所謂代表者的問題，有時在這種 MSN 通話時也會有類似問題。這個問題可能太接近現實，像時事或新聞觀感，可是，我覺得放在知識脈絡上，其實也是可以談到彼此對彼此的認知不熟悉。包括暑假舉辦的博士生研習營，雖然，大陸來的比預期中少，可是面對面接觸是很直接的，他們反應給他們到台灣的情況也很直接，包括他們聽台灣學生報告（present）議題時，他們也會說：怎會有人關注這些問題啊？可能是他們比較沒有看到的，像人類學背

景的台灣學生研究東南亞族裔問題。

我跟上海朋友可能是因為老師帶我們出去，不小心碰上的。我們常開玩笑說，絕對不能只是吃飯、喝酒，但問題是我們都只是學生，也不知道怎麼做才能具體地做些什麼？這次他來我們也聊到，可能可有共同閱讀文本兩邊交流，而交流又要如何突破隔海？這有可能是文字回應，可是文字回應又不能取代現場討論臨場激發的感受。而另一問題是，他們有研究中心，我是因為他們才知道他們自己有些出版品，所以，他也會想知道我們的。聽說幾年前，包括社文所、亞太、清大中文系，就是台聯大，已經簽署一些合作，這個運作有沒有可能，是從學術出版開始？比如說，我能不能在社文所的公共空間中，看到這些單位所生產的東西，有時還滿立即的，就像我會被學姐問到，研究室有沒有羅崗的書？我說，沒有。有時，我們邀請一些人來演講，也會遇到外所同學問老師出版書的狀況。放在機構間交流的層次，可以實際接觸到學術生產的東西，其實還滿重要的。甚至，我也很想知道嶺南、大陸碩、博士論文的狀況，而我認識的朋友也想知道社文所學生在做什麼？

陳光興：有些是可以做的。可是，和上海同學碰到很立即事件的部分。像剛才戴老師講的，我覺得是沒法置換的，戴老師說他來了才瞭解台獨情感，就像我在北京半年，我才知道大陸為什麼不可能瞭解台獨，而且，中共官方對台獨的容忍遠大於民間。可是，要把你自己的身體，擺到那個生存環境中，這是沒有辦法。最好的辦法，是你在那個環境裡生活半年，大概會比較有機會；我猜想，是在講羅小茗，羅小茗要來這邊待一陣子，才能慢慢透過碰到事情去感受。身體是沒法透過閱讀去置換的，因為閱讀文字是這些東西最後的結果。這是我搞到現在最大的問題，你不了解那邊的東西，只有文字很難認識。所以，我說文字很難落地，生產過程是全部不見了。不只是兩岸這樣，香港、新加坡，都是要進去以後才會知道這個地方是這樣，所以講話不會亂講，不會太輕易，因為你知道物質條件、狀況。還有嗎？思仁。

柯思仁：我回應剛才劉（人鵬）老師所說的情況，我們的學生非常願意到清華大學，但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大概不會願意來新加坡中文系做交換學生。這牽涉到一個知識交流的情況，我們的學生對台灣各大學中文系知識情況、對象很有興趣，但倒過來不一定這樣。這是要先產生知識交流的場域，才可能來談怎樣的對等互換與交流。現在，我正指導一個史書美的學生，他對東南亞新馬文學有興趣，他是 UCLA 的學生，他申請互換來新加坡一年，他的互換單位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但是那邊沒有人指導他，就透過史書美跑來找我，我來幫助他在新加坡收集材料思考問題，是這種方式。另外，我有個學生他本來做中國電影，我跟他說既然來到新加坡應該要做華語世界的電影，所以我說你要做華語電影一定要到台灣去看看，台灣從八〇年代到現在整個電影生產的情況，是不可忽略、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說他要看書。我說，不可以，一定要到那個地方去瞭解那裡的文化環境。像這

樣的情況，我是不是有可能讓這個學生找個在台灣的老師，做一個時期的指導，例如一個月、三個月，或是，跨國的指導，比如說我有個研究生，他有興趣做台灣跟新加坡的公民社會、電影或文化的比較研究，是不是在現有框架中可以做得到？但是，MOU 以外的，我想也是靠個人的聯繫，也能做得到雙方指導一個學生。對於知識上的交流，我想這是個重要的起步。

陳光興：下一步會往這個方向作。何老師是地主，說了才算。邀請大家吃晚飯。作為元兇，非常感謝大家，沒有浪費時間，地主要不要講話？今天就到此。

何春蕙：謝謝大家。到了性別的地盤，想要什麼書就搬，我說的是外地來的客人啊。